

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Zhong Guo Jin Dai Xue Shu Ming Zhu



弢园文新编

王 韬 著

李天纲 编校

中西書局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主编 钱锺书 执行主编 朱维铮

弢园文新编

王 韬 著

李天纲 编校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弢园文新编 / (清)王韬著; 李天纲编校 一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6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 钱锺书主编 朱维铮执行主编)
ISBN 978 - 7 - 5475 - 0285 - 3

I ①弢 II ①王 ②李 · III ①政治思想史—
中国—近代 IV ①D092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5271 号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

弢园文新编

王 韬 著 李天纲 编校

责任编辑 张 荣 周春梅 路征远

特约编审 李国平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 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0285 - 3/D · 008

定 价 38.00 元

重版前言

朱维铮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册，于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为繁体字直排本。现在重版，改由上海中西书局刊行简体字横排本。*

当年由我撰写的初版编者说明，关于编纂过程，交代如下：“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过程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凡十年，其中必有曲折。我的陈述没有虚语，但说得太简单，刊出后未免引出猜测和议论。

起初有种议论，以为钱锺书先生不可能同意任丛书主编。事实呢？一九八八年早春，我应邀赴北美两所大学承乏客座教席，途经香港，与正在振兴香港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业务的董秀玉总经理兼总编辑，商讨她年前的一个提议，要我主编一套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名著的丛书。她同意我用五年编成晚清编三十种的设想，随即由我以主编身份，与香港三联签订了出版第一辑十种的合同。这时董总又提出，为利于丛书在两岸三地发行，可请钱锺书先生出任丛书顾问。

没想到不久董总即告知，她专程赴京，将我起草的晚清编计划面请钱先生审阅，钱先生很感兴趣，并当场删去原拟选陈炽《庸书》一种。

我和钱先生素昧平生，此前在复旦大学曾两度受命筹办中国文化的

学术研讨会，均委托友人代邀钱先生出席，他均未莅临，而我仍将所编《中国文化》及国际讨论会文集寄请他过目。或因此，他对我稍有了解，当董秀玉女士请他担任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顾问时，竟慨然允诺。这使我很感动，虽在海外辗转数校，仍不断以函电敦请有关专家分担首辑十种的整理校点，自己也编纂较难的几种。

事情往往出乎逆料。大概在一九八八年初冬某日，董总致电给我，说是日前钱先生对记者发表谈话，内谓他已破例同意担任香港三联将出版的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主编”。董总深感署名处理为难。我以为钱先生可能记忆偶误，却对丛书在海内外被读者接受有利；至于我的署名无所谓。问题是合同已规定主编应对编纂的稿件负责审定，并撰写每一种的学术性导言，这对年已七十八岁的钱先生可能有困难。其后商定，有关责任仍由我履行。

岂知事情的变化更出意外。我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从德国转道香港回沪，董总谓丛书校点稿排印很快，要求我即写导言，以便陆续出版。不料仅过月余，便发生那场风波，影响所及，香港三联书店也改组。新调任的总经理和总编辑，都表示承认已签合约，但对我相继交付的书稿，包括每种的学术性导言，则于收到后预付合约规定的稿酬外，便搁置不予出版，理由是香港市场小，学术性书籍卖不掉。

怎么办呢？合约未改，我仍算主编，而我在学校勉强恢复教学秩序之后，除了带研究生，便全力逐篇从事导言的撰著。董秀玉女士已回北京三联书店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她关心丛书的出版，港方却答以等我将十篇导言交齐再议。她建议我将已改定的导言，径寄钱先生审阅。我依言寄出拟列为十种首篇的《汉学师承记》导言稿，不久即得钱先生委托杨绛先生代笔的复函，大意谓收到我的“大作”，将留下“学习”云。那信息很清楚，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与丛书编纂的关系。这使我想起他为台

湾版《钱著七种》所写的前言，内将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遭遇，称作“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人民日报》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八版），现在是否表明他还要看一看丛书的命运呢？其时约在一九九二年夏季，钱先生已逾八十，风闻他和杨先生都身体欠安。于是我函告董总，表示不再以书稿事打搅钱先生。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一次书面通讯，当然此后也无缘识荆。

鉴于我早将十种书稿交齐，香港三联当局仍迟迟不予刊行，因而董秀玉女士遂通过购买版权，将十种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于是丛书晚清编历经八年磨难，总算提上问世日程。不知董总怎样说服了钱锺书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仍署钱锺书主编，而我则署作执行主编。奇怪的还有香港三联当局，他们以高价将丛书版权售予北京三联书店，却又附带条件，须将书版交给香港三联，另换封面印港版五百册，就是他们估算的丛书在港台的销量。我对这种“生意经”感到寒心，从此不敢和这班人打交道。

丛书出版后，有位“钱子家”写信命我提供与钱先生的交往情形。我如实答以没有直接交往。岂知此君即作长文痛骂我学识浅陋，所编丛书十种均为劣质品云云。我不得不作文说明丛书编纂实相，建议这位图书馆学者，最好不凭臆测追究他人动机。此后被人称作专写“容安馆毁人录”的这位作者，便视我为仇敌，在所谓揭秘的“大字报”中，会莫名其妙地扯上我，骂我将丛书编坏了，却又不说坏在何处，可谓深悉诬人三昧。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初版三千五百套，早已售罄。十多年来，多有朋友建议重印。钱锺书先生早已逝世。董秀玉女士也已退休多年。我于近年身罹沉疴，于是同意上海中西书局，接受李国平先生的建议，用简体字横排重版印行。

重版必须重校。好在当年参与整理点校的诸位学者,如今均成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都为承担的成书的重校尽力。李国平先生还关注重版本的编辑发行。当初我撰写的十篇导言,出版后曾得读者商榷,现在除叙事数处略有修正外,余均依旧,至盼读者继续指正。

重排本署名,均依初版,以保存那段曲折历史。当然,仍须申明,全书由我设计体例,选定版本,通审校点,撰写导言,如有此误不当,均应由我负责。

2011年11月28日三改

* 其中《卮书(初刻本 重订本)》《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为繁体字横排本。

编者说明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晚清编,主要辑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以期展现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异过程。

遴选的学者和论著,着眼于学说有新意,有己见,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领域,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

结集则不拘一格,以专题为主,每种或收一人一书,或辑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

编者对每种都做以下工作:选择底本,取原校较精的刊本;异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复核引文,凡原著约引节引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均出校记;重施标点,包括分段;编制索引,分人名、书名两类。

编者对每种都撰有导言,附于篇前。导言既重可读性,以助读者了解相关专题的历史实相;也重学术性,当然属于导言作者的一得之见。为行文简明,诸导言凡引证出处、考订史实或商榷疑义,均以附注形式陈述。

限于编校出版的条件,晚清编拟分辑刊行,初定每辑十种,先成先印。如可按设想出齐,当能略见系统性。

这套选编,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

全编原定由两岸三地同时出版,因而版式定为繁体字直排。第一辑早已编成发排,由于种种缘故,长期不克面世。现由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推出。

编者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处参预编纂的年轻同仁,感谢三联书店辛勤校勘的诸位编辑,同时期待高明指正。

编例

一、本丛书选辑十九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学说名著,每种均由编者予以校勘整理:

底本。以原刊为主,有不同版本者择善而从。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误,兼正原作者明显笔误,并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据正误。一般不作理校。除对校诸本择善而从者外,凡校勘改动处均出校记,以顶注形式见于同页。他校所得亦以校记出之,于正文不作改动。

节录。于篇题下注明,并于篇末注明节录出处。

标点。原刊本无标点或仅有旧式断句者,概施以新式标点。

分段。文言文论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读者。

注释。作者原注概从原刊。编者增注限于指出原著有关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显讹误,以顶注出之。

译名。中文译名及译文概从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并有讹误,则由编者径予改正。为方便阅读,若干种书末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新译名均依中国大陆出版物的通行译名。

版式。概用繁体字,直排式。除涉及语言文字学说外,凡原刊古体字异体字,均改为通行繁体字。原作或有双行夹注,现均改为单行夹注。

索引。所选诸种均增编人名、书名两种索引,以便通检。

二、本丛书所选诸种,专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参考价值者,予以保留,并移作附录。每种前均冠以导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导言

朱维铮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灭亡到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发生,这二十年间,清帝国的日子,较诸在前的四分之一世纪,要好过一些。东南的起义烽火渐趋熄灭,西北的边疆动乱也被平定。美国刚结束南北战争,日本才开始明治维新。苏伊士运河虽已开通,欧洲列强却又在相互厮杀。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不仅再度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均势,而且暂时减弱了资本主义列强东进争夺在华权益的势头。即使觊觎中国边疆领土最穷凶极恶的沙俄,迫于野心与实力很不相称,不得不签订交还伊犁的最后条约,承认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清帝国的内政。

因此,这二十年间,国内人心思治,国际环境有利。依照中世纪式“大乱大治,小乱小治”的古老观念,清帝国无论在逻辑上在历史上都有了振兴的希望。

事实上,清帝国的统治已有若干改变。随着一八六一年咸丰皇帝死去,一场宫廷政变使一名不起眼的年轻女人,战胜了满族贵族为主的顾命大臣集团,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六年的独裁统治。这个女人被称作西太后或慈禧太后,因为她始终以皇帝母亲的身份发号施令。随着中国最后的这名女主登场,内政外交都有了变化。承认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家的汉族军阀的某种地方自治权,促使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终于违反祖制容许各国公使入驻北京,使清帝国不再通过粤海关和十三行那些相互勾结以谋求私利的官商,而能与西方列

强直接对话。一八六七年开设京师同文馆,一八七二年成立上海招商局,一八七五年首派大臣出使秘鲁,一八七六年首派学生留学美国,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平定回疆,一八八二年新疆建立行省。诸如此类,发生于同治(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光绪(一八七五至一九〇八)之际的事件,给了帝国朝野上下以某种希望。乐观者称之为“同治中兴”或“同光新政”。

然而,晚清历史表明,“中兴”也罢,“新政”也罢,都不过属于皮毛的改变。出身于叶赫那拉氏族的太后,有能力将八旗贵族玩诸股掌,却没有能力改变由一个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造成的复杂社会政治问题。建立在满汉联合统治基础之上的帝国政权,有可能在权力分配方面进行调整,却不可能克服中世纪权力结构带来的基本纲常术法矛盾。愈违祖制而愈遭反抗,愈行开放而愈受非议,这就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基本现象。

现象固然不同于本质,但本质的显现必须借助现象。当那二十年人们都惑于现象,同声赞颂“中兴”,至少承认“新政”效应之时,持异议者当然被视作鴟号枭鸣。这些鴟枭,其实是真正的改革者。在同、光之际,他们的人数很少很少,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马良、马建忠、陈炽、陈虬、宋育仁等,便是我们可以列举出的姓名。可是,从冯桂芬以下,这些改革者都是在中国论中国。他们从鸦片战争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学,并以西方政教为尺度,抨击国政,呼吁改革。但他们的尺度,都来自耳闻,或有目睹也不过来自上海租界。生于江南,长在上海,青年时饱受西式教养,中年后避地香港英国,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人生最宝贵的而立至耳顺的年华,都在域外度过。由域外看域内,眼光不同,批评不同,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也不同。

当时独具此只眼者,就是王韬。

一

王韬，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十月四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1]，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一字懒今。后因上书太平军，事发遭缉捕，改名韬，字仲弢、子替、紫诠，号天南遁叟，著作结集名为“弢园”。韬者，弓剑之衣也，引申为怀才而自晦的意思。

韬父昌桂，字肯堂。诸生，舌耕为生。王韬自称年少嗜酒，读书之余，结社赋诗，观荷探梅。十八岁为诸生；次年（一八四六）赴南京应乡试，虽不中，却藉机在白下眠花宿柳，冶游无度^[2]。可见那时他的家境不菲。十九岁继父业，在陈墓镇设馆授徒。二十岁娶杨氏，生女。此后三年，苏南水灾，家中“三为偷儿所苦”^[3]，一八四九年，父亲忽尔病故。“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计，不得已橐笔海上”^[4]，再步其父后尘，转为中国近代第一代以译述西书为职业的新式知识分子。

原来，王昌桂于一八四七年到上海，在西人宅中“授经”。次年王韬至沪探亲。船入黄浦江，这个开埠才六年的都市的繁华外观，便令他感到“几如海外三神山”；继而同西人接触，入宅作客，参观印书，更使他对西方事物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一八四九年夏他父亲去世，经主持墨海书馆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数次函邀，他便于同年秋来沪同西人合作。此后王韬述及自己的工作内容，只说“授书”、“授经”、“校书”。实际上，他们父子是在帮助以麦都思为首的“翻译《新约》圣经委员会”，翻译中国第一部官话《圣经》^[5]。十一年后，王韬离开墨海书馆，在香港英华书院，协助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成英文，从西经中译到中经西译。理雅各每月付王韬二十元。无论在沪在港，传教士们对王韬都是友善的。

但王韬的心情并不顺遂。今存《弢园尺牍》，录有他早年致亲朋故友的多封信函，虽语多文饰，却透露他旅沪遁港的头十七年，始终由于感受中西两种文化的夹击，所产生的失重心态。

传统的士大夫教养，使初到上海的王韬，既不适应英国清教徒那种严谨刻板的工作方式^[6]，又不甘心放弃出则以文章显达、退则以诗赋扬名的固有追求^[7]。于是，每见大吏，即行献策。可说是身处洋场，目注魏阙。然而，时不我济，徒伤命薄。眼见自己的言论化成别人的实践，他只能叹为“用其言而弃其人”^[8]。

然而与西方神学家朝夕相处，知彼渐深，又不自觉形成看人看事的另外尺度，不同于传统的价值准则的新尺度。因而在不满西方雇佣制度的同时，王韬又对那些因种种原因而麇集沪上的清朝士大夫，越来越看不惯。尽管他还不敢明斥两榜出身的昏官贪吏，但痛诋小文人附庸风雅而蝇营狗苟，嘲讽大名士谬托通人而欺世盗名，则时时见于他给至戚知友的书信^[9]。

既然夹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却对彼我两个世界都不适应，那么一个在学术界争讼多年的问题，即王韬是否署名“黄畹”的那道《上逢天义刘大人禀》的作者，从而王韬因此受到清政府通缉是否冤案^[10]，便不难判断。那篇文章确属王韬作品。除以往学者已寻出的证据外，急于用世而不获所售，同宗基督而谬托知己，惯为博徒而轻于冒险，这样的错综心态，外加当时太平军虽已内外受挫，但与腐朽的清帝国相比，孰为鲁编，尚在未定之天。因此，似乎用不着从化名考索，也用不着历举王韬避地香港后那些自辩如何欲盖弥彰，但就文章看文章，所献策略与王韬向清朝大吏的上书，预见相反而思路相同，便可断定作者非王韬莫属。两个口袋里掏出的是同一货色。

王韬万不及料的是他在关键时刻押错了宝，而他在—一八六一年冬给

太平天国苏福省行政长官的禀帖，次年夏天便落入清军之手。当时上海的治外法权还在襁褓中，虽有英国驻沪领事和传教士庇护，王韬身居租界也难逃清朝地方当局的缉捕。于是他不得不抛妻别女，将图书财物托付给前妻兄长，便仓皇登轮逃往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

王韬到香港后便改名易字^[11]。那本是传统的文人积习。改名为韬，字仲弢，原寓良弓在囊中等待主人取出使用的意思。^[12]没想到他指望的主人，湘军头目曾国藩早死，淮军头目李鸿章迟至二十年后，才因他已在香港办报成名而表示愿罗致入幕^[13]，堪称晚清首例“出口转内销”。

当清帝国赖以镇压太平天国的汉族军阀，凭藉缴获的黄畹《上逢天义刘大人禀》原件，而缉捕王韬并迫使他逃亡香港的时候，他们没有料到此举给中国造就了怎样一名真正“知时务”的人才。即使王韬本人，当他化装爬上洋轮驶往香港的途中，也绝没想到不过五年后，他居然能在当时西方世界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发表讨论中西文化优劣的演说，并在爱丁堡大学参观时被称为中国“学士”^[14]。

王韬与伦教会联系，但因他在著述中并不袒护教会，对天主教还时加批评，加之一贯的江南名士作风，诗酒高会，冶游无度，愤世嫉俗，顾盼自雄，曾与宝山蒋敦复（剑人）、海宁李善兰（壬叔）并称“海上三异人”。因此人们常以为他是传统士大夫者流。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受洗基督徒^[15]，尽管基督教思想确实没有改变他什么。这个矛盾现象，是晚明基督教再度入华以来士大夫信徒的老问题。它说明两种文化的互相吸收转换过程是多么艰难。改宗皈依基督教，并不意味着同自己的文化传统实行决裂。信徒再虔诚，所受教养的影响和环境的拖累，也不可能一朝改观，哪怕是一个翻译了《圣经》的人。一个相关问题：王韬是否通英语？据查证，他的英语不敷应用^[16]。这对与英国传教士相处

几十年的人来说是奇怪的,但也可见当年士大夫对外国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的态度。

离开上海到香港,王韬便受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聘,合作翻译《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从一八六三年起,相继完成了将《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竹书纪年》等译成英文的工作。时值同、光之交相对平静的年月,又远离内地的政治漩涡,王韬的用世热情被压抑下来。“闭门日多,罕与通人名士交接。”^[17]一八六七至一八七〇年,应理雅各邀,王韬离港赴欧,至苏格兰助译《易经》。途经意大利、马赛、里昂、巴黎。在伦敦游览,在牛津演讲,会见了威妥玛、李泰国等朋友。在杜拉(Dollar)见北极壮色,工作间隙访爱丁堡、阿伯丁、格拉斯哥。此行在清“蒲安臣使团”初使泰西之先,作为“访问学者”,王韬也是清末第一人。异国的风土民情,固然使他大开眼界,而刚经历工业革命和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留给他的印象更深,同时他和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使他在—八六七—年返港后所写的《漫游随录》,在同类作品中最为真切细致。

一八七二年,理雅各退休回国,王韬和黄胜倾其财力,加上朋友资助,用一万银元买下他的伦敦会香港印刷所(L. M. S. P., HK)创办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随后,在洪士伟、伍廷芳、胡礼垣、何启的协助下,王韬自任主编,创办第一份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和上海《万国公报》、江南制造局周围的变法人物遥相呼应,形成一种改革舆论,影响了岭南和江南的青年一代^[18]。而王韬也实现了角色转换,以“学贯中西”的知时务名士的面目,重新引起人们注目。一八七一年,他编译出版的《普法战纪》,在国内和日本都引起轰动。那时曾国藩便想罗致他入两江总督幕府,因曾于次年病逝作罢。一八七九年,寺田宏、重野安绎、冈千仞、龟谷行等一批日本名流,邀请他访日两月。行程中两次途经

上海,受到盛宣怀等的接待。在日本,又受到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的殷勤照拂。这都表明他在清政府官员眼中已不再是“逆犯”,而是必须结纳的在野闻人。这次旅行,留下一部《扶桑游记》。

从日本旋港,王韬加紧谋求回沪的努力。此事迁延十数年^[19],最后得到李鸿章出面,致函上海道冯竹儒:“昆山王君,不世英才,胸罗万有,沦落香港,殊为可惜。执事能为我招致,不惜千金买骏骨。”^[20]有此安排,王韬终于在一八八四年重回上海。受到上海的新派人物的推重。格致书院选举他为掌院;《万国公报》聘他为特约撰稿人;《申报》则聘他为编纂主任;唐景星、郑观应还在招商局为他造册,挂名支取生活费^[21]。一八八五年,自办木活字印书馆“弢园书局”。^[22]有三件事可以代表他的时代地位:一八七九年春,在上海,郑观应携《易言》(《盛世危言》前本)来,求序于王韬;^[23]一八九五年,英商汉璧礼回国,捐银六百两,委托广学会以《何为当今中国变当务之急》为题,征文全国,王韬任评委主任,给了康有为未奖;^[24]一八九三年,经郑观应(一说陆皓东)介绍,孙中山得以拜见王韬。王韬亲笔为孙修改了《上李鸿章书》,推荐到《万国公报》发表^[25]。一八九七年,老病逝于城西草堂^[26]。

二

王韬是近代第一批的职业文人。他靠当编辑、翻译、报人、出版商和流行文作家谋生,尽管他对此仍感自卑,但对自己能留下如此众多的著作,暗中还是得意的。据《弢园著述总目》称:六十岁前,已刻未刻著作三十六种;另《弢园老民自传》列五十三岁前有二十六种,其中四种不见于《总目》,勉强合于他六十三岁时《序〈剑华堂续罪言〉》一文所称“四